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BRITISH NEW LEFT THINKERS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BRITISH NEW LEFT THINKERS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张亮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6372-4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政治思想—研究—英国
IV. ①D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6727号

书 名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编 者 张 亮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4
字 数 292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372-4
定 价 3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编者的话

1956年以后,一些欧美国家陆续爆发新左派运动。这其中思想成就最丰硕的要属英国新左派。在该运动实际存在的四分之一世纪(1956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里,英国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理论的贫困”面貌的同时,将英国打造为一个可与德法比肩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即便在该运动已经终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寻找共产党和工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内都积聚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它们周围。然而,不管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工党内,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占据领导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只能默默地专注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可能道路,同时以个人身份积极参与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反对朝鲜战争等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1956年2月24日深夜,在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已经闭幕后,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然而非辩证的批判。三个月后,这份秘密报告流传到西方,让欧美左派知识分子极为震惊。各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对各自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推动党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在英共内部,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公开信,批评党内缺乏自我批判的风气,认为英国存在马克思主义脱离英国现实和经验的弊病。迫于形势的压力,英共领导层同意汤普森等人创办了一个争鸣性的党内刊物,但很快又借机将他们调离该编辑部。同年10月、11月间,“匈牙利事件”爆发。英共对苏军武装行动的支持,引发了随后的大规模退党风潮,近万名党员(占英共当时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党员)退出英共。退党后,不少左派知识分子选择放弃社会主义信仰、脱离现实政治,而汤普森等人则变得更加活跃,希望能够在共产党的体制之外寻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与此同时,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也遭遇重大思想危机。一方面,进入50年代以后,工党内部否定传统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修正主义思潮不断壮大,倾向修正主义的工党领袖日益增多。1956年,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出版了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这让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另一方面,同年10月、11月间,英国保守党政府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勾结法国和以色列悍然入侵埃及,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整个英国统治阶级都不再抱有幻想。

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下半年以后,英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左派讨论圈子,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打破了以前共产党和工党之间的门户壁垒,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反思传统左派(共产党和工党)的思想缺陷和政治弊端,探索符合英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左派运动就此兴起。作为一种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英国新左派主要通过爱德华·汤普森等主编的《新理性者》和斯图亚特·霍尔等主编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向公众进行自我展示。1960年,这两个杂志合并重组为《新左派评论》,霍尔任主编。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及其历史贡献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最初的思想核心是汤普森等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的新左派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虽然政党属性与思想资源略有不同,但拥有非常类似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所以对很多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接近。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把他们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就学科背景而言,最为活跃的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是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这是由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决定的。经过战后十年的积淀,他们在1956年前后陆续进入了思想的成熟期。新左派运动的爆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理论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迅速涌现,其中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两部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英国缺乏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的贫困”局面由此得到根本改变。

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而言,第一代新左派的历史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清算了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与建构,树立了一种比较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英国知识分子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第二,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研究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创造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理论新形态,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和发展。第三,深入发掘英国的社

会主义传统,提出了人道主义和道德对于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新左派运动早期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

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崛起

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初,与第一代新左派并肩战斗的还有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一批激进的新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受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激励,这批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生具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这与立足英国的第一代新左派存在明显差别。他们也因此被命名为第二代新左派。

对于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第二代新左派一开始就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对。具体地说,他们认为第一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后者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重的经验主义色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不过,在运动的第一阶段(1956—1962年),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要与第一代新左派分道扬镳的意思。除了羽翼未丰这个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59年以后,工党内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这使两代新左派都认为英国历史性地出现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派重新占据上风。这促使两代新左派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分裂由此发端。

1962年5月,安德森出任《新左派评论》主编。在他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欧洲大陆,希望从那里寻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寻找到新的未来。借助萨特、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汤姆·奈恩很快对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即“安德森—奈恩论题”。该论题通过概要式地追溯英国民族性的历史形成,彻底否定第一代新左

派关于英国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判断,认为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已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该论题一经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产生热烈反响与共鸣。虽然汤普森随即代表第一代新左派对它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全面驳斥,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话语权已经历史地转移到了第二代新左派手中。

1966年以后,《新左派评论》对后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译介。这一工作的最重大结果是导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批判、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革命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整个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都致力于在各自领域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型,并在文化研究、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等领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历史地看,结构主义转型不仅使第二代新左派获得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理论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实现了一次方法论创新,从而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的学术疆域中,将第一代新左派所开创的各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非理论化倾向,使已经积累的理论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具备了世界性传播的现实性。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及其遗产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对第一代新左派带来了巨大冲击。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其中,汤普森于1978年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第二代新左派随即进行还击,一场大争论就此拉开帷幕。

就在两代新左派围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鏖战正酣之际,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出任首相。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

势推进,资本主义似乎治好了“英国病”,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在英国重新变得遥遥无期。这使得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70年代初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结果,80年代初,当围绕“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基本结束时,两代新左派突然发现:自己曾为之奋斗的新左派运动本身已经终结了。

作为英国战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新左派运动为当代英国思想留下了一笔巨大遗产。即便是在已经被消耗了近30年后的今天,这笔遗产依旧显得价值不菲。首先,活跃在当代英国思想舞台上的重要左派思想家都出身于新左派运动,他们的思想都以各种方式受到新左派运动的深刻影响。其次,新左派运动提出了许多重大观念,如今它们已经演变成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主题。最后,新左派运动为英国左派政治想象引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等),今天它们再一次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

目 录

编者的话 1

1. 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 玛德琳·戴维斯 1
2.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 斯图亚特·霍尔 37
3. 雷蒙·威廉斯的新左派政治学 罗宾·布莱克伯恩 53
4. 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历史学家 迈克·贝斯 69
5. 爱德华·汤普森的伦理激进主义及其遗产 迈克·肯尼 96
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工人阶级 诺拉·卡林 伊恩·博查尔 111
7.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拉尔夫·密里本德 列奥·潘尼奇 146
8. 自由、欲望和革命: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保罗·布莱克里奇 173
9. 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之路 詹姆斯·普罗科特 204
10. 汤姆·奈恩的民族主义理论:历史发展与当代批判 尼尔·戴维森 243
11. 佩里·安德森的早期新左派政治学 保罗·布莱克里奇 293
12. 伊格尔顿学术思想概览 大卫·爱德森 325

1. 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

玛德琳·戴维斯

斯图亚特·霍尔曾说,英国新左派“一向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问题、苦恼、危险,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把他自己归类为“在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状态中工作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展研究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以马克思主义进行工作的人、努力工作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① 霍尔尽管说的是他自己,不过,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这种批判而又值得尊敬、充满创造性的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应当说也适用于更普遍意义上的英国新左派。确实,在那种多样性的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与承接了不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其他流派的相互比较中,不同的流派间都出现了意见分歧。在某些阵地上,特别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围绕在《新左派评论》周围的那一大批人有关的阵地上,就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那里得出的那种革命图景而言,出现了某种理论上的退缩。相反,一些新左派人物则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需要从根基上进行再考察的传统:早在 50 年代,查尔斯·泰勒就质疑它是否具有解决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能力。有的人的思想发展轨迹

^① S.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et al., e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79.

存在相当大的改变：最初倡导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爱德华·汤普森后来离开了任何明确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而威廉斯的发展轨迹则刚好相反，随着工作的深入，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在所有不同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阐明、提出——作为1956年事件及其后果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确存在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新左派规划。当然，这并不是要暗示：所有新左派思想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左派可以从根本上被理解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团体。相反，这不过是说，英国新左派与众不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持续努力在特殊的、深刻影响了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发展历程的英国意识形态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引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对原先的理论进行再解释或批判。正因为如此，它对英国政治理论图景做出了真正创造性的、实验性的理论干预，并且，它确实发生过持久影响，虽然后来出现了冲淡马克思主义的趋势。

本文追踪了新左派在与某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结合中不断发展的历程，目的在于推进人们对更宽泛意义上的当代英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理解。新左派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整合进了英国的知识文化之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外来传统输入或者嫁接到本土文化上的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在与英国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的过程中引进、吸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意识形态“本土化”过程。不过，与英国新左派的历史编纂学有关的那些主要的假定并不能很好地提供对这一过程的发展机制的更充分理解。因为既有的历史编纂学倾向于聚焦英国新左派的内在环境而不是外在环境、追问它的内在断裂而不是它的更广泛的重要性，因此，往往看到的就是不同新左派流派或“代际”之间的尖锐差异。所以，本文第一部分与新左派历史编纂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辩论，并提供了一种重点关注共同的论题、发展的连续性以及思想的杂交生长的解释。有人认为，新左派最好是被视为一种危机

的产物，一个力图在特定的英国条件下对追随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创造性反思的思想实验室。这项计划在不同时间强调不同的重点，但对最终的重点，所有的流派都做出了贡献。这一解释为后面关于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的总体看法提供了基础。在那一部分，我试图表明：不同的新左派流派或思想家是如何采纳、再解释那些有重要影响的新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将其运用到英国的理论语境和政治语境中去的。

对英国新左派的解释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新左派”这一术语是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范围内青年激进主义的高涨——它最终在 1968 年的骚动中达到了高潮——联系在一起的。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它通常被用以描述 50 年代后期发端的那种旨在开辟新的理论—政治空间、寻找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努力。在空间上，它延伸到了西欧和东欧、美国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在时间上，经 1968 年运动的推波助澜至少持续到了 70 年代早期。^① 英国新左派既与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新左派激进主义运动相互交织，但它也有自己特殊的、更早可以追溯到 1956 年的起源。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运动。它的独特性既存在于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理论运动——之中，也在于它受到了（前）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更加强烈的影响。

英国新左派是在对已经察觉到的一种双重危机的反应中兴起的：这一危机既是赫鲁晓夫 1956 年“秘密报告”之后世界共产主义和英国共产主义的危机，也是英国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这项事业

^① G. Katsiafica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Left: A Global Analysis of 1968*,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7, p. 27. 参见其中对共同因素的讨论。

主要是由一些与新闻出版、学术研究有关的知识分子贯彻的。^① 回避传统的组织形式、深切关注文化、折衷主义的理论影响,这三点将新左派与其他宣称占据了这种“第三”空间的社会主义形式——如托洛茨基主义——区别开来。不过,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评论,在如何界定英国新左派问题上存在的共识很少;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把定义问题和解释问题割裂开来处理。这种方法论问题是由其本质导引出来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消解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学术工作和政治实践之间的传统界限的组织构成,确切地讲,它为学术讨论和社会实验提供了一个同场竞技的舞台。正如迈克·肯尼的评论所言:“因此,理解它的历史和‘意义’是相当复杂的工作,不同层面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行动都需要得到讨论。”^②

这一组织构成的历史通常被叙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区别的标志是《新左派评论》的控制权在1963年转移到了佩里·安德森手中。1956—1963年这个阶段习惯上被视为“早期”新左派或“第一代”左派兴旺活跃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两种不同的但具有互补性的倾向围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走到了一起,并以(创立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为支点,完成了创造一场“思想运动”这种初始性的尝试。这两种倾向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团体,它创立了争鸣性刊物《理性者》,该刊物后来以《新理性者》之名在英国共产党之外继续刊行;另一个则是团结在牛津编辑出版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周围的一大批更年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不过,新左派的这种特征在1962—1963年前后就消耗殆尽了。从那以后,《新左派评论》开始追求一种不同的规

①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这是迄今唯一一本概要性的研究。M.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5. 这是对1962年之前的早期新左派分析得最好的一份资料。

② M. Kenny, 'Interpreting the New Left: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New Left Review* 219, September-October 1996.

划,主要是一种以在英国开创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为目的的理论说明和构建规划。“第一代”新左派的力量因此被冲散了。有些评论家因此不同意“新左派”这一术语还适用于第二阶段^①,但主流倾向还是认为:虽然“第二代”新左派开创了一种具有新的差异的事业,不过,它依旧处于其前辈所开辟的“第三空间”中。而后者则继续存在并创立了其他一些事业。林春鉴别出了四种在1963年之后构成新左派的“建制性倾向”:《新左派评论》;约翰·萨维勒和拉尔夫·密里本德在1964年创办的《社会主义纪事》年刊;理查德·霍加特创建、斯图亚特·霍尔推进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在1966年发起的历史工场运动和《历史工场杂志》。不过,她肯定,像雷蒙·威廉斯这样的一些人并不正式隶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团体,他们也构成了新左派的部分语境。因此,林春实际上承认不能仅仅从组织层面上定义新左派。明确划定新左派事业的重点也很困难,因为不少相关机构都维持到了现在,甚至连人员都没有变。不过,到70年代后期,“新左派”术语就变得不那么切合实际了,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左派知识文化的普遍扩展已经使得把“非新左派”思想从“新左派”思想中清理出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试图依据代际或者建制性倾向来定义和解释新左派,存在一些相关问题。依据代际进行定义,其困难在于不好处理某些人的文献,尤其是霍尔和威廉斯,他们的著作——不管是就编年而言还是就主题而言——切断了任何明确的代际区分。“第一代”、“第二代”这种区分,过于认同1962—1963年间围绕《新左派评论》的管理权所发生的那场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争论,也过于认同汤普森和安德森随后发生的那场争强好胜的交锋,在交锋过程中,汤普森称1962—1963年的控制权变化是接管甚至

^① 奈杰尔·杨把第二阶段视为一种明显向老的左派传统的回归。Nigel Young, *An Infantile Disorder: the Crisis and Decline of the New Left*, London: Routledge, 1977, p. 145.